

# 中产过渡阶层的矛盾心态及其原因刍议

葛天任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探讨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及其社会根源,认为这一阶层群体的社会心态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矛盾状态。中产过渡阶层的矛盾心态表现为获得感和无力感并存、权威意识和权利意识并存、保守行动和激进行动并存。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超大城市的中产过渡阶层心态最为矛盾复杂。本文强调,职业发展机会受阻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导致矛盾心态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策上应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优秀的公共文化资源,进一步破除束缚职业发展的户籍、劳动力等体制障碍以及落后的、保守的价值观念,从而推动中产社会的平稳形成。

**关键词** 中产过渡阶层 社会心态 社会行动 中产社会

葛天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200092

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因其阶层地位处于中产阶层与社会下层群体之间,总体上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矛盾状态,并带有其阶层地位的过渡性特征,这种矛盾心态反映在其地位认知、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等诸多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区域化的典型特征<sup>[1]</sup>,这一阶层群体在不同城市或地区,会形成生活成本、市场机会以及相对阶层地位认知的差异,其社会心态差异也非常大。那么,什么是中产过渡阶层?这一阶层的矛盾心态表现在哪些方面?导致其矛盾心态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如何才能缓解或者应对这种社会心态?本文尝试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学界给予更进一步的重视和更为详实和深入的调查研究。

首先,在概念内涵上,本文所研究的“中产过渡阶层”比中产过渡层涵义更广些,它既涉及到了中产阶层中与下层群体接近的部分,也涉及到了下层群体中与中产阶层接近的部分,而中产边缘层(下文常简称:边缘中产)指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的边缘部分。为了更加明确地界定这一阶层群体,本文按照“国际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ISEI)的标准来区分,本文将ISEI分值38-45分的群体定义为中

[1]李强、王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产过渡阶层群体。由于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复杂,本文将把关注点放在这一群体中的经营销售群体边缘层、技术人员队伍边缘层、普通职员办公室人员边缘层和服务人员边缘层等上述四类社会群体。

其次,根据已有研究,社会心态主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sup>[1]</sup>,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基调、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sup>[2]</sup>,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地域性,更因不同的文化、亚文化的影响而具有特异性<sup>[3]</sup>。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心态主要是指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的某一阶层群体的集体心理、价值观念和行动倾向<sup>[4]</sup>。社会心态具有复杂性,既受到某一阶层本身的社会特质的影响,又与社会环境、文化网络和相对阶层认知有较大关系,并且还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下。社会心态研究需要深入地挖掘量化指标背后的社会心理意涵。为此,本文主要采取了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访谈、文献搜集、新闻报道材料的运用等进行研究。笔者将首先分析中产过渡阶层的矛盾心态,而后分析其社会根源,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 一、中产过渡层矛盾心态的三种表现

### 1. 生活的获得感与无力感并存

正如韦伯所言,人类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人们也总是根据周围那些可以比较的人和事物来营造自己的心灵世界——赋予意义、期望,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寻找价值依据。中产过渡阶层不需要像社会下层群体那样付出更为艰辛的体力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也很难按照他们所羡慕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来生活,但这一阶层的社会心态表现出了矛盾性——获得感与无力感并存。

如果说近年来的房价飙涨、资本市场动荡,以及长期以来对优质医疗、教育和养老资源的高度期待,让中产阶层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的话<sup>[5]</sup>,那么这些变化或者期待对于中产过渡阶层而言,则更多是带来了一种比焦虑感更为严重的无力感。比如在社会经济环境中,由于不具备中产阶层的职业发展空间和物质财富,却需要面对更加现实的就业竞争和更为剧烈的职业变动挑战,使这一群体的“中产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与中产核心群体不同,他们必须要做出实际的选择和行动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一群体对物质上的成功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中产过渡阶层把生活的核心追求转化为金钱的计算,他们变得更为“务实”,甚至也更为“市侩”更为“投机”。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到,生活在超大城市和其它大中小城市、乃至农村的中产过渡阶层群体在社会心态方面是具有较大差异的。所谓超大城市<sup>[6]</sup>主要是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中产过渡阶层群体而言,其人生期望值与实际生存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落差,尤其是那些外来年轻有奋斗意愿的群体,其矛盾心态则更为凸显,正如网上广为流传的“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说

[1]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北京〕《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2]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4]一般而言,社会心态的衡量指标包括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念、社会行动等,为了研究的方便和针对性,笔者按照由精神到行为由内向外的顺序将其归为三类即心理、价值观和行动倾向。

[5]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北京〕《文化纵横》2016年8月。

[6]根据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的超大城市有6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

法,实际上成为这一群体的内心挣扎的一种“写照”。相较而言,对于其它城市<sup>[1]</sup>中的这一群体而言,总体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只要适当降低生活水平和状态的期望值,实现的一定程度上的“中产梦想”,难度相对较低。在访谈中,一位20岁在沈阳市某中型婚纱摄影公司负责图像处理的小A君,与我详细地比较了他在北京和沈阳实现中产梦想的难易程度,他在北京的月收入是4000元左右,而在沈阳则为3000元左右,但考虑到沈阳的房价相对较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北京,而在沈阳他还是有可能实现“中产梦想”的——“有车有房、娶妻生子”,他说,“毕竟生存比生活更重要”。

## 2. 政治价值观的权威意识与权利意识并存

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同样展现出了矛盾状态。一方面,这一阶层群体的个体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以小商贩为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会选择通过多种途径“依法维权”或者“以法维权”<sup>[2]</sup>,也会通过自媒体和新媒体来引起更大层面的社会关注。当然,这种权利意识具有局限性,只有事关自身利益,他们才会团结起来寻求更大的利益诉求保障。这种“团结”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团结”<sup>[3]</sup>。从笔者所调查的情况来看,中产过渡阶层的投机心理是非常强烈的。以笔者所调查的北京、上海等地菜场拆迁为例,菜农、个体户很难形成集体行动,个体利益的理性计算更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行动。

另一方面,在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同时,中产过渡阶层也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权威主义价值观。这一群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比较低,总体上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事务,在对诸多社会和政治议题的看法上,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强势国家和权威人物所推进的整体社会变革。在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上,这一群体更多地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冷漠”。访谈中,很多人表示,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由于国家强势反腐,到政府办事变得更容易了,因此在对反腐政策的态度上表达了相当程度上的激进支持。在对特大城市强力推进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及拆除其所赖以生存的菜场、服装、小商品交易市场等问题上,笔者所访谈的多数人表现了出奇的冷静和沉默。一位在西苑菜场卖了10多年菜的安徽农村籍B君表示,“这是国家政策,我们没有办法,很多人并没有离开,因为生活了10多年了,离不开,也回不去了”。他把多年积蓄全部拿出来买了一辆轿车,加入了滴滴公司,成为了一名专车司机,而他的妻子也只好转做家政服务。总体上看,这一群体敬畏和崇拜权力,自身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长。与中产核心层和社会下层群体相比,这一阶层群体的矛盾性更为突出。如果说中产核心层更多地表现出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追求,下层群体表达了更多地权威意识和变革愿望,中产过渡阶层群体则表现出了二者并存的矛盾状态。

## 3. 社会行动保守和激进并存

与中产阶层的观念“激进”、行动保守不同<sup>[4]</sup>,也与社会下层观念“保守”、行动“激进”不一样<sup>[5]</sup>,中产过渡阶层在社会行动方面也表现出了比较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在其表达利益、权益诉求的时候,这一群体具有“保守”的一面,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市侩主义”的投机心理都会影响到其社会行动;另一方面,这一阶层群体在涉及到更为整体性、宏观性的社会议题或者遭遇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规模集体表达之时,也展示出了非理性的、激进的一面。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和矛盾特征可以相互转化。一

[1]根据人口规模,可以区分为特大、大、中小城市三类城市。

[2]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长沙〕《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3]汪建华:《实用主义团结——基于珠三角新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4]激进与保守是相对而言的,这里的激进主要是指社会政治态度或者社会行动上寻求变革,不同于常规的、保守的政治行为。这一观点请参见: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上海〕《社会》2011年第2期。

[5]社会下层群体具有更强的权威观念、但更倾向于参与激进的社会行动来表达自身诉求。

且集体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持续扩大到一定程度之时,这一阶层群体的保守的一面就会转变为激进的一面。例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大红门事件”、“反日游行”等群体性事件中,这一特点也表现得十分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中产过渡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边缘群体,展示出了比较激进的政治参与倾向。尤其是,生活在超大城市的被称作“蚁族”年轻普通“白领”群体,在涉及重要的、宏观的社会议题时,不仅社会政治态度较为激进,而且社会行动倾向也趋于激进。其社会心态相对其他中产过渡群体更为矛盾。在经济增长放缓、生活压力增大的时期,这一群体的社会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过高的物质主义生活期待,难以实现的中产梦想,难以回乡的文化心理和就业现实,都让这一奋斗在超大城市的年轻中产边缘群体处在一种彷徨与矛盾的心态之中,其潜在的社会行动倾向甚至非常有可能借助激进民族主义或激进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出来。概括而言,中产过渡阶层总体上在行动倾向上普遍展示出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行动倾向取决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走向。

## 二、中产过渡阶层矛盾心态的产生原因

### 1. “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与“相对社会心态”

导致中产过渡阶层矛盾心态的原因,既有社会分层结构体系所带来的客观因素,又有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转型所带来的主观因素。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这一阶层群体社会心态的上述三种表现。

首先,从客观因素方面来看,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体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相关研究指出,我国社会分层体系受到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影响很大,单位、行业和区域等集团性因素对收入分配起到了非常大的“结构壁垒”、“资源垄断”、“机会阻隔”作用<sup>[1]</sup>。但实际上,在所有社会资源分配当中,真正受到结构和制度等再分配手段影响的恰恰不是收入,而是教育机会、医疗资源、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机会<sup>[2]</sup>。恰恰正是这方面的区隔,使得这一部分群体无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和社会地位的上升<sup>[3]</sup>。李强教授认为,综合多方面因素来看,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体系内部集团之间的差异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它是“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后文简称“区域体”)之间的差异,由于单位体系基本已经解组,行业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城市之间<sup>[4]</sup>。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区域综合体”的差异,李强教授区分了中国社会的四个世界,即“超大城市”、“特大型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在这些差异化的区域体中,城市的规模越大,中产过渡阶层群体的规模也越大,超大城市集中了最多的中产过渡阶层群体<sup>[5]</sup>。

其次,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所形成的“生活世界”,对于中产过渡阶层的世界观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相对阶层地位的差异,人们的社会心态具有“相对性”,不同城市的中产过渡阶层拥有差异化的“相对社会心态”。因此,基于生活成本、公共服务资源、自我期望值、相对剥夺感、阶层认知等主客观因素的巨大分化,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

[1]王天夫、王丰:《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郝大海、李路路:《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王天夫、崔晓雄:《行业是如何影响收入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4]李强、王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3]席敏等:《“新蓝领”:城市边缘人》,〔北京〕《经济参考报》,2014年4月25日。

[5]李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北京日报》,2015年5月25日。

态也就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区域化特征。综合分析,笔者认为中产过渡阶层的心态可以分成三个“生活世界”:超大城市(一般指人口超过1000万人以上)、中小城市(50到1000万人口之间)以及县乡和农村社会的生活世界。人们在不同“区域体”中,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建构一种属于这个区域体的自我认知观念体系,这对其集体心理乃至社会心态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此意义上,超大城市中产过渡阶层由于生活在两种或者多种生活世界的冲突之中,在身份认同、消费文化、自我期许等诸多方面展现出了更为突出的矛盾状态,及人格或者行为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对于中小城市的中产过渡层而言,由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他们的矛盾心态并相比而言要更为缓和。值得重点讨论的是农村社会的中产过渡阶层。由于农村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生活机会等总体而言相比城市差别较大,其社会心态则明显有着下层、底层色彩,对外部世界的憧憬与当下生活状况依然构成了结构性张力。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所建构的现代生活价值体系给农村社会的礼俗秩序带来了巨大变化和挑战,甚至一些农村中的富裕群体的社会心态也出现了某种焦虑、紧张,甚至是无助感。

## 2. 主客观因素叠加增强了生活的无力感

由于超大城市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最为矛盾和突出,因此有必要进行详细讨论。尽管近年来超大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提高很快,但是其总体供给水平仍显不足<sup>[1]</sup>。加之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相对薄弱,“房价”高所带动房屋租金和生活成本上升,这些客观的社会生活压力加重中产过渡阶层的焦虑感<sup>[2]</sup>,对于缺乏职业向上流动机会、社会基本生活和权益保障的中产过渡阶层而言,生活的无力感已经转化为逃离都市生活的实际行动。笔者访谈中一对来自江西的中年夫妇说,他们以经营杂货为生,兼职多种副业经营,“蜗居”在京郊的一个城中村之中,家庭年收入少说也在10万元左右,他们在老家还建有一座宽敞的2层小楼,为了让这座老家的房子高过邻居,他们接下来的奋斗目标就是再赚20万。之后再作选择。

除了户籍、劳动力和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客观性的因素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过度消费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念,它将导致这一阶层群体抱有与其实际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不符的生活需求和期待。消费主义价值观简单讲就是人生的价值追求更加物化,通过物质消费来证明身份地位、体现人生成功。这一社会群体同样将个人价值的体现注入到物质消费的满足之中。这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快速变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中,这一阶层群体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方面,更多的是通过影视传媒,而不是传统的纸质阅读,即电视剧和电影在其生活时间的分配中占据较大比重,并对其价值观塑造影响较大。然而,近年来影视媒介充斥被建构的精英主义消费文化和一个物质化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世界。由于中产过渡阶层的文化消费主要来自于更为容易接受的影视作品,这种社会文化价值的转向也就无形中加强了他们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

当强烈的赚钱欲望遇到了无法满足的物质欲望,就会产生更为突出的无力感。与中产阶层相比,追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更光鲜亮丽的服饰,更为刺激的文化消费,同样也是中产过渡阶层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但是一个无奈的现实是,他们拥有超大城市的消费意识,却不拥有超大城市的消费能力。因此,对超大城市的中产过渡阶层群体而言,尤其是其中的外来年轻群体,不断上涨的社会生活成本、户籍限制、购房焦虑、职业发展困境等多种因素,就像“紧箍咒”一样束缚了他们奋斗的动力,击碎了中产边缘群体的“中产梦想”<sup>[3]</sup>。

[1]陆铭:《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上海〕《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5月7日。

[2][3]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北京〕《文化纵横》2016年8月。

### 3. 职业发展机会受阻是主要原因

尽管导致中产过渡阶层的矛盾心态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但核心原因仍然是中产过渡阶层的职业发展机会受阻。也就是说,客观的制度性、政策性因素是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一整套与这一阶层群体的市场地位特征相对应的职业证书认证制度<sup>[1]</sup>,也没有更为有效地建立相对完善、规范的市场营销环境,因此,中产过渡阶层的职业发展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制度性限制。在中小城市则由于“关系社会”的缘故,职业发展机会更加受到约束,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权力或者大资本的挤压。即使不考虑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昂贵本身就是资本和劳动力集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是,其它城市的职业发展机会受阻也是导致大量中产过渡阶层群体向更大规模城市集中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有着“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心态<sup>[2]</sup>。社会分化的拉大以及阶层固化加剧的趋势,增加了人们对社会流动中不公平现象的不满、愤怒、乃至嘲讽。各种媒体报道和网络上传为流传讨论的“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屌丝”等传媒用语,既不断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也反映了公众包括中产过渡阶层群体的地位认知和不满心态。笔者认为,在影响社会流动的诸多因素之中,职业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它关系着个体的发展空间、收入、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因此,建设一个社会纵向流动通畅的社会,首先就是要破除职业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也是缓解中产过渡阶层矛盾心态的治本之道。

## 三、政府应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大众文化资源

### 1. 更加重视引导中产过渡层的价值观念

综合上文论述,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既有具有鲜明的区域化特征,又具有固有的阶层特质,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对不同“区域体”的中产过渡阶层“相对社会心态”的分析中,超大城市的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最为矛盾。经济增长的不稳定、高涨的房价、社会保障不足、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都是影响这一阶层群体的重要社会因素,但笔者认为,最为核心的原因主要是职业发展机会受阻,尤其是在超大城市之外的广大城市地区,市场环境乃至阶层固化趋势束缚着这一阶层群体的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流动机会。正是以上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集体心态、社会政治态度和集体行动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激进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阶层群体的社会心态的发展趋势极具可塑性,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培育并将这一阶层的矛盾心态转化为更为积极的、更为稳定的健康心态。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过渡阶层的社会心态对改革的成功影响重大。当前,改革处于关键时期,下一步的社会政治改革方向事关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众所周知,社会心态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在社会心理深层结构上是否对政府、对改革充满信心。中外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成功的改革都拥有一个良好的、积极的社会心态作为支撑改革的社会信任基础。因此,如何调整和引导这一阶层出现的矛盾心态,让这一阶层群体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抱有更加坚定的希望和信心,应该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调整和改进相关体制性束缚的出发点之一。

### 2. 提供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和大众文化资源

基于上文的分析,导致中产过渡阶层的主要因素是职业发展机会受阻,以及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

[1]李强:《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条重要渠道》,[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

[2]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消费主义倾向较为严重。为此,政府应该更多地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和大众文化资源,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逐步增加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逐步缩小逐渐拉大的城乡区域差别和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别。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涉及到如此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体系的调整,则改革推进需要一个渐进过程。

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规范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发展行业协会发挥其自我调节的社会功能,破除束缚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市场瓶颈和体制限制,建立起一整套职业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全社会崇尚实业、尊重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社会风气。例如,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举办职业技能大赛,鼓励中国职业技能人才走出国门,更多地参与国际比较、进行国际交流等都是非常好的做法。此外,在提供更多更好的大众文化资源、营造大众文化价值体系方面,需要政府通过多种文化政策,鼓励更多反映乡村、市民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影视文学作品,繁荣平民文学、乡村文学,鼓励社会公益文化事业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对匠人精神的发掘和弘扬,从鼓励职业精神、建设职业伦理型社会观念体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做法。实际上,上述举措也并非新鲜事物,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就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社会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和专业力量已经在实践中推动这些层面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但是,将之上升到政策层面,由政府来引导和支持,则更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也更有利于整个社会职业体系的健全完善,更有利于大众文化的健康繁荣。

### 3. 社会公众亦需多一些理性平和心态

从社会公众角度讲,也需要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态焦虑和矛盾、对社会政治改革的不确定和风险抱有更为成熟、更为理性平和的态度。因为中国社会总体上长期以来处于一种物质贫乏状态,仅仅是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社会物质文化才极大的繁荣起来;加之近四十年来,经济一直处于高歌猛进的状态,整个社会心态也随之处于一种乐观积极的“亢奋”状态;因此,社会整体层面的过度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普遍流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与之相联系政治经济体系也势必要进行重大调整,因此社会心态的转换也无可避免。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讲,也需要多一些理性平和的心态,建构一种与当前经济下滑、社会快速变迁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层面的“新常态”<sup>[1]</sup>。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主导阶级的政治成熟性。一方面,社会精英群体,包括中产阶层群体,作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主导社会力量,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推动社会的平稳转型。另一方面,作为支撑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力量,社会中下层群体也应该摒弃极端化思维,调整过度消费主义的非理性预期和文化价值观念,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终将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群体。当然,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对中国精英移民现象的担忧,对中国游客海外旅游负面形象的批评、对在社会上广泛蔓延的“暴发户”心态、“土豪”形象的调侃,对“屌丝”生活状况和挣扎内心的自嘲,对公众理性平和包容声音的呼唤,都可以看作是社会心态钟摆回摆的表现。因此,更为值得期许的是,整体社会心态或许正在发生更加积极的变化。

[责任编辑:方心清]

[1]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北京〕《文化纵横》2016年8月。